

主编 江伟

蓝天出版社

中华文化史集萃 (44)

中医与中药

王 科 编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史集萃/江伟主编. —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5

ISBN 7-80081-820-9

I. 中… II. 江…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177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64 $\frac{3}{8}$ 印张 375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定价:286.00 元(全套 60 本)

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历代炎黄子孙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先民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继承并发扬优秀的古文化,让它们服务于今天的社会,是当代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华文化史集萃》丛书,从各个方面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在范围选择上,注意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使之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我们力求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把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事物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当前状况等,作比较系统的介绍,使之尽可能清晰、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注重实用性和借鉴性。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帮助广大读者有效地继承中华文化,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由于水平有限,其中不乏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一	古代中医学	1
二	中医学理论	30
三	著名的中医学大家	52
四	发展的中医学	60
五	中药的历史	68
六	采药与中药加工	75
七	药性与中药用法	93
八	有趣的药名	111
九	中药专著	122

一 古代中医学

(一) 曙光初现，源于实践

中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据考古资料证明，距今约 170 万年前，在我国金沙江畔就已生活着元谋人，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中国远古文化的发轫从兹肇始。在元谋人化石产地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的炭屑，且伴随有动物化石，其中一些颜色发黑的骨头，专家鉴定可能为烧骨，说明元谋人已经知道用火了。在距今约 60 万至 20 万年的北京人的洞穴中，发现有木炭、灰烬、烧石、烧骨叠压很厚的堆积层，证明北京人不仅在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地对火进行控制使用。而据遗物分析，距今约 1.8 万年的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

火的应用使原始人从“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进化到熟食，极大地扩展了食用动植物的品类。于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我们的祖先逐渐认识到某些动植物对人体有害，而某

些动植物却能治疗某种疾病，最初的医药知识由此萌芽。《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氏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过程。中医所用药物多源于天然植物（草药），故称为“本草”。同时，人类在用火的实践中，发现身体的某些部分可以因熏烤而感到舒服，甚至因而缓解或消除某一局部的疼痛和病变。于是，人们试着用兽皮、树叶、沙土烘烤后敷贴在身体的某一部位；或用树枝、草根等做燃料进行局部的固定炙烤，这样就发明了原始的“烫法”和“灸法”。

火的运用还引发了陶器的发明和完备。如距今约5 000至8 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黑色陶器。这时，随着药物品种的不断增加，人们用药经验不断积累，对疾病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于是，我们的祖先尝试着根据不同病情选择多种药物配成复方，并盛于陶器内煎熬成汤液，这样既提高了疗效，减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又使患者服用方便，还使药物剂型得到了很大改进。

原始人创制、使用最早和最多的工具是石器。我们的祖先在制作和使用石器时，逐渐发现锋利的

石片（古称“砭石”）可以切开脓疮，加快创面愈合。他们还逐渐尝试着使用石针（尤其是更加锐利和纤细的骨针）刺激身体某些特定部位，以达到镇痛、治病的目的，这就出现了最初的外科手术和针刺疗法的萌芽。

我们的祖先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和繁衍着。与大自然、凶禽猛兽的斗争使他们经常发生外伤。他们逐渐发现：使用抚摸、按压，或用泥土、树叶、草茎涂裹伤口，可以起到止痛、消炎、复元作用，久之，便产生了推拿、正骨和一些外科治疗的初步技术和知识。

采集和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相对丰裕的植物食品，于是，原始酿酒业应运而生。由植物酿造的酒，辅以各种药材，具有生津、驱寒、活血、通经的功效，“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故后世称“酒为百药之长”。我国是最早酿制酒的国度之一，也是最早将酒用于保健、治疗的文明古国之一。汉字医（醫）从“酉”，就是明证。

原始社会的先民们为了庆祝打猎的胜利，常常模仿飞禽走兽的奔跑跳跃姿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祭祀神灵、追奠祖先的原始宗教活动中，如痴如醉地伸展，扭动肢体。久而久之，人们发觉这

种运动方式于身心健康大有裨益，这即后世的“导引”、“吐纳”等保健方法的缘起。

上述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医药知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遥远的中华文明源头时期，在代代相传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和创造出来的，它是无数经验、智慧、勇气和想象力的结晶。应该强调的是，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处生活着、奋斗着的先民们都对这份珍宝作出了贡献。《素问·异法方宜论》称：“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导引接跷者，亦从中央出也”，就形象地反映了这幅全息图景。

原始社会是我国中医药学的发端时代，不过，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中医药知识的萌芽只能和原始的生产技术、生活常识、哲学思辨、宗教观念、艺术活动等等杂揉在一起，尚未分化、沉淀、独立出来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二）初具雏形，卓然独立

5 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迈过了野蛮时代的门槛，踏入了文明时期。

奴隶制度在带来了血腥压迫、残酷剥削的同时，也迎来了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专门的脑力劳

动者的出现而导致的各类科学的自觉形成。在奴隶社会时期，我国的中医药物学正式从一般的生产技术和生活常识、原始宗教和哲学思辨、艺术体育等中分离出来（当然仍和它们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形成较其他国家和民族医药知识色彩迥异、独具特点的科学体系。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能辨认的已有 20 余种疾病，大体按人体部位记述病名，如病首、病目等，另有小疾（小儿病）、疙育（产妇病）等名目。甲骨文的“蛊”字像虫在皿中，表示人体腹中的寄生虫；“龋”字像虫蛀齿，这是世界上关于龋齿的最早记录。这些，都说明了从夏、商朝开始，我们的祖先已经较科学地将各种疾病分门别类，进行认识和治疗。殷墟出土的文物中有壶、盂、勺、盘、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在殷墟还发掘出较完善的专门化的畜圈、厕所、水沟等卫生设施。西周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于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合理要求，如：“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人畜便泄必须“离沟井”；人有病，应“内外皆除，彻褰衣，加新衣”等等。当时，人们已能不但从外部条件寻找预防疾病的措施（《左传》所谓“土厚水深，民之不疾”），而且从人的自身内因探求发病的

根源（《礼记》所谓“百病怒起”、“忧郁生疾”）。同时，人们还初步总结出了一些优生优育的规律（《礼记》称“三十曰壮，有宝；”《左传》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等等）。

西周始，中医有了分科。《周礼》载医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一套较完整的医疗组织和医疗制度也初步形成。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医疗过程必须有病历记录和报告制度：“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对医生定期进行严格考核：“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直至春秋时期，“学在官府”，显然，医生的培养、任命、供职、行医、考核、俸禄，全由官府掌管。这一方面保障了中医事业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中医事业受到了一些限制和束缚。

史载商朝第一个国王汤所任用的相伊尹，也是一个杰出的中医药家。伊尹（前16世纪——前15世纪）先辈为伋氏（小国君）厨师，所以他也善烹调，初为汤王的奴隶厨师。伊尹喜医学、擅长保健术，常与汤王谈论调味药和延年益寿之道。《甲乙经·序》称他精于本草药性，炮制汤液，这是我国

医药史上的一大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据传伊尹撰有《汤液经法》一书，被后世奉为医方之鼻祖，（惜此书汉代散佚，《伤寒杂病论》中许多药物都选自此书）。伊尹为我国历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位烹调大师和医药学家，开创了中医“医食同源”的传统。殷商一代，人们对医药学的认识突飞猛进，如商王武丁就讲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愈）”，强调对症下药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在制汤液前需将药材”咬咀（咬嚼），慎重选药。

从现存历史文献来看，春秋时期人们对各种疾病的产生原因开始进行科学探讨和总结。《周礼》称“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都已发现了时令、气候的变化与疾病流行的关系。公元前541年，秦名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病时，阐述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这是见诸文字的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诗》、《书》、《易》等典籍中，都有许多关于热病、寄生虫病、不孕症、浮肿等疾病较为正确的描述。

认识疾病是为了战胜疾病。春秋时期，先民对药物的认识和使用方法更加丰富和系统。《周礼》

将中药材整理归纳为“五药”（草、木、石、虫、谷）。《诗》中提及葛、苓、芍、药、蒿等 50 余种药物。《礼记》规定：“孟夏月也……聚蓄百药”，说明当时已有特定的集中采药的活动。《周礼》称：“凡疗病以五毒攻之”，“疡医学……副杀之齐”，表明当时医生已将矿物质腐蚀剂广泛应用于疮疡外科。稍后成书的《山海经》更是集我国古代中医药知识之大成，它记载了 146 种药物（其中植物 59 种，动物 83 种，矿物 4 种），可治数十种疾病，用药方法有食服、佩带、涂抹等许多类，还可预防 60 多种疾病（其中防蛊 8 种，防疫 4 种，强身壮体 25 种，防五官病 8 种，防皮肤外科病 8 种，防脏器诸病 4 种，防兽疫 1 种，避孕 2 种），尤其是其中所载 2 种避孕药物、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的计划生育用药，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水平之高超。

春秋时期，名医辈出，其最优异的代表为扁鹊（前 5—前 4 世纪）。史载扁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别行“带下医（妇科）”、“耳目痹医（五官科）”、“小儿医”等，说明中医早已有较完备的分科。扁鹊还将“信巫不信医”列入“六不治”之中，说明中医学已经毅然与宗教迷信分道扬镳，卓然独立，自觉地担负起救死扶伤、匡世济民的重

任。不过，此时的中医学尚处于积累经验的滥觞阶段。

（三）大厦奠基，理论形成

战国、秦、汉时期，新兴的封建制度全面取代了腐朽的奴隶制度，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政治、科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发展和长足进步。这几百年间，大规模的战乱和天灾接踵而至，迭出不穷，也呼唤着中医学加速前进，以维系中华民族的命脉。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中医学的第一个高峰，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全书共 18 篇，分《素问》和《灵枢》各 9 篇。《素问》主要论述脉理和病因，《灵枢》主要论述经络和针刺。它总结了战国之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当时哲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阴阳、五行、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它一方面用当时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指导，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中

医学的基础上，丰富和提高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黄帝内经》中许多内容大大超过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医学水平。在形态学方面，它对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上与实际情况吻合。如它称人之食管与肠的比是 1: 35，非常接近现代解剖学得出的数据 (1: 37)。在血液循环方面，它提出“心主身之血脉”，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些，比英国哈维于 1628 年发现血液循环早了 1000 多年。稍后成书的《难经》是一部堪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共 81 篇，托名扁鹊所著，以问答形式阐发《内经》本旨，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对《黄帝内经》的不足多有补充，同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前 168 年）出土的竹简、帛书中，就有关于经脉学说、脉学诊断和治疗的记载。而在武威出土的东汉早期医药简牍，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内、外、妇、五官等科医方 30 条、用药 100 种，有汤、丸、膏、散、醴、滴、检等剂型，且几乎全是复方。约成书于东汉时

期的《神农本草经》，共录药物 365 种，计有植物药 252 种，动物药 67 种，矿物药 46 种，在临床上有明显的疗效。《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善的药物学专著。该书提出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原则，一直为中医药学所沿用。

东汉张仲景（150—219 年）长期刻苦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著《伤寒杂病论》一书。他从临床实际出发，吸取当时医学上的新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学说，脏、脉、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辨证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还论述了一些处方用药的加减变化规律。《伤寒杂病论》是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医学经典，为中医治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医家治病程序更臻完备。西汉初名医淳于意（前 215—？）首创医案（时称“诊籍”），详细记录患者姓名、职业、地址、病情、治疗经过、预后等情况，不但体现了医生严谨负责的职业道德，而且为总结经验、发展中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行之有效的手段。